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中书写文明史,创造人类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命运与共的新历史!

文明史研究的中国视野*

朱孝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明史编撰,要有中国视野和中国特色。中国视野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中国特色,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史进行研究和阐释。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编纂文明史,也各具特色。中国学者背靠深厚的中国文化研究文明史,凭借的是中国的观察角度、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中国的人文关怀传统。

—

15、16世纪,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从西方人的眼光看,首先看到了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封建国家的差异。他们认为,近代国家具有主权、领土完整、官僚机器、常备军、议会,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结束了封建割据,获得了全国性的政治统一。中国的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以为上述诸种特点,如主权、领土完整、官僚机器、常备军等,在中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具备,很明显,那个时期的中国断然不是近代国家。从中国的角度去思考,就能够认识到仅从国家结构完善上来论述国家的近代性是不充分的。欧洲的近代国家与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有关,也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有关。从“民”这条思路去理解,就有民意、民生、民权,近代国家对此加以尊重并予以维护。民族国家,当然还要有对大民族的文化认同。所有的士瓦本人、法兰克尼亚人、巴伐利亚人,都认为是德意志人,这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样,还要有近代民族文化兴起,那是知识精英(如莎士比亚)创作、国家支持、符合民意的文化。所以,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问题上,中国学者至少可以加上几条: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近代民族文化的形成;大的民族文化认同;人民参与政治程度增强;政治合法性上摆脱血缘和神授,转向维护民众和公共利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对近代民族国家的阐释就比较完整了。

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文明史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整合和张力这两个概念。中国学者对它们比较陌生,在写中华文明史时,似乎用不到这两个概念。往浅处想,这与西方文明的替代性演进方式有关。西方文明的发展常常是替代性的,发展过头了,需要矫枉过正,所以需要整合。例如,希腊是一种样子,罗马是另外一种样子,日耳曼人的王国又与前两者相当不同,后来,又出现了中世纪的神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时代和工业革命后的物的时代。西方文明的这种发展方式,与中国文明循序渐进的演进方式是相当不同的。

中国文明的发展,连续性成分居多。每分每秒都在调整,但是,基本的结构、框架变动并没有欧洲那样剧烈。欧洲文明与此不同,文明的演进分成几个步骤:首先是文明的稳定阶段,不久进入争论阶段,出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接着,出现了实验阶段,大家发表观点,互相争论,落到实处就是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6)的阶段性成果。

做实验,积累经验,酝酿改革;然后,就进入改革或革命的阶段,暴风骤雨般把旧制度摧毁,建立新制度;革命之后,还有一个阶段,即整合阶段,就是把改革之前的合理因素和改革之后的合理因素整合到一起,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制度层面上把改革或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这个时期过去,新的文明出现,就进入稳定时期。这种演进方式,使西方人感到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欧洲曾经出现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文明整合,触及一些深刻问题。一是希腊元素,感性,有创造力,但也很脆弱。二是罗马元素,强大的军队,强大的法律,结果却崩溃了。三是日耳曼元素,正处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时期的日耳曼人建立了很多小王国,逐渐发展出一些封建因素。四是基督教兴起。这四种元素的整合,看起来不是很成功。原因有三:一是四种元素的差异很大,不容易融合;二是这种整合是被动的,是西罗马帝国崩溃造成的,并非是一种主动的整合;三是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政治分裂,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促进这种文明整合。从结果上看,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这四种元素基本上是独立发展,到公元800年左右才完成融合,建立起比较有规模的封建秩序。从西罗马帝国瓦解后三百多年的历史看,战争连绵不断,经济非常落后,城市文明变成了农村文明,发达的工商业变成了自然经济,这都与文明无法顺利整合有关。与之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灵肉合一的整合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主动的整合,结果比较成功。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宗教改革史和德意志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有一些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西方学者研究宗教改革,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宗教,也探讨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教派对德意志诸侯邦国产生的影响。我国学者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德意志的近代化,研究核心是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从近代化的角度去研究宗教改革,就有了对宗教改革的新的阐释。例如,把从教会、修道院里没收过来的资金转变成公库,用来救济穷人和病人;年轻妇女不再在修道院里修道了,她们回归家庭;宗教仪式简化,减轻了社会的负担,把几十个宗教节日取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文化方面,大学引进了解剖学,引进了病理学,维登贝格大学就是这样做的,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这些发展有时要付出沉重代价。例如,1522年汉堡法庭宣判一名医生死刑,因为他为了完善妇产科医学,去观察妇女的生育过程,被抓起来,最后处以火刑。^①现在,解剖学确立,病理学确立,医学开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些都是德意志的近代化。这些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学者对德意志农民战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探讨运动的革命性上。与之不同的是,欧美学者研究德意志农民战争史,仅把这场战争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闵采尔、盖斯迈尔等人,被认为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闵采尔等革命者,重点放在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英勇表现。^②中国学者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建设方面,即1525年的革命者如何创建新制度,如何构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纲领。^③

闵采尔和盖斯迈尔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的两个人物,恩格斯还提到反映在闵采尔思想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萌芽。中国学者研究这两个著名人物,发现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治上,实行选举制度、任期制度,保障人民的利益;经济上,废除私有制,实现分配上的平等。盖斯迈尔写的《蒂罗尔宪章》,对政府如何管理商业、矿业、农业,以及如何改革货币,都写得明明

① M. J. Tucker, "The Child as Beginning and End: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ildhood", in De Mause, ed., *History of Childhood*,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p. 238.

② Max Steinmetz, "Theses on the Early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Germany, 1476 - 1535", in Bob Scribner & Gerhard Benecke, eds., *The German Peasant War of 1525: New Viewpoints*, George & Unwin, 1979, pp. 9 - 10.

③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4—238页。

白白。经济怎么搞,农业怎么搞,沼泽地怎么搞,商店怎么设置,货币怎么改良,都呈现出人民国家的特征;在分配制度上要求集体富有;在社会方面,要实施社会救济,帮助病人和穷人。^① 这些研究表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不仅表现为反抗封建制度的坚决,更表现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② 可见,从中国立场出发,可以对西方文明史上许多争而不休的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二

重视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运用中国研究史学的方法,能够对文明史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程应镠曾经这样论述史料:“史籍是我们现在研究国史的重要史料,除此之外,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历代碑刻、墓志、器物图录,都是史料。”^③可见,史料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2008年,周施廷发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一文,对路德的政治立场进行研究。据作者研究,在文字记载的材料里,路德在政治上是相当保守的,但在图像材料中,路德常被描绘为农民战争的领袖,包含着不少激进的内容。她提出要用多种材料研究路德,既可以以以往根据文字文献把路德说成是保守者的观点进行商榷,也可以利用图像这种完全不同的原始材料,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重新解读。^④ 运用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结合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找到两种材料之间的不同,分析不同的原因,能够对以往的解释提供新的见解,也能够开辟运用图像材料研究外国史的新天地。

重视史料、考证史料、研究历史、阐释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初,德国、美国、意大利都出现了相对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客观性进行全盘否定。譬如,德国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失败后,就有人出来指责客观的历史学。他们认为:人们获得的历史知识并非真实的历史,既不能反映真实,也不能反映真理。例如,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宣称:历史根本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赋予无意义生命某种意义的创造性行为。所有有关过去的观点,都是那些追求未来的信仰和希望的人所创造的神话。科学的历史观念只是另一个这样的神话,因为只有自然界才能产生真理,其确定性能够用实验和数量来表达。^⑤ 在他们笔下,历史学如此这般被糟蹋,戕害了科学历史学的发展。

中国的历史研究,强调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要进行原因和后果的分析,都要对事物产生的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些问题。例如,古代希腊的艺术作品大多是雕刻而成的神像,而且被制作得精美绝伦、美轮美奂,有脱离现实的成分。如果问一位艺术史家,他会告诉你,这是古典希腊的艺术风格,是对天堂中理想原型的描绘,是古代希腊人的精神信仰和理想寄托。但如果问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答案就会不同。

在中国史学家眼里,古希腊的艺术品产生于一个烽火连天的乱世。公元前12世纪,爱琴海文明

① “Michael Gaismair’s Territorial Constitution for Tirol”, in Tom Scott, Bob Scribner, eds.,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Humanities Press, 1991, pp. 265–269.

② 朱孝远《神法、公社与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140、170—207页。

③ 程应镠《史学通说》,《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④ 周施廷《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327.

遭到北方蛮族入侵的严重破坏。其后,希腊人在这块曾经有过丰硕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了灿烂的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真正始祖。进入奴隶社会后,希腊半岛上出现了两百多个奴隶制城邦国家,每一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城郊农村组成大小不等的国家,各自为政。其中最强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由于国穷民贫,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城邦国家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弱肉强食。为了保存自己,掠夺财富,城邦国家还实行了强国强兵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塑造神像用来维护希腊的国家统一,成为希腊艺术家的使命。古代希腊诸多城邦林立,要使处在战争状态的各个城邦的人都感到自己是希腊人,就不能塑造某个城邦的伟人,而要塑造各个城邦都公认的奥林匹斯诸神。如果艺术家只雕刻雅典名人,那么斯巴达人就不认可。如果歌颂斯巴达的英雄,那么雅典人也不高兴。那么,干脆雕刻神像好了,因为宙斯、赫拉等住在希腊北部高耸入云的奥林匹斯神山里,他们是整个希腊的文化象征。正是出于这个政治原因,希腊雕刻不仅以描绘宙斯、波塞冬、阿波罗等神灵的英俊为主,也雕刻以美丽著称的阿芙洛狄忒、雅典娜、赫拉。希腊艺术以神像为描述对象且又必须把神像雕刻得精美绝伦的谜团,在这里得到了一种解释,即实际上是用文化促成希腊统一的一种手段。

欧洲的另一个文化高潮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雕刻品与古希腊的雕塑非常相像。如果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放到雅典博物馆去,毫无违和感。但是,尽管相像,两个时期的艺术品所蕴含的内容是相当不同的。古希腊人雕刻的是神像,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雕刻的是人像。古希腊作品反映的是如何去当英雄的主题,古希腊人常常梦见自己去遥远之处摘采金羊毛,或去海边屠杀毒龙。这里面体现的是对英雄的崇敬和对理想的追慕。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有两个主题,既要弘扬人文主义新文化,又要批判封建时代的旧文化。以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为例,蒙娜丽莎的年龄是不确定的,既像是一位年轻的少女,又像一位保养得很好的少妇;她是否高兴也是不确定的,她在微笑,但更像是在郁闷;蒙娜丽莎的身份也是不确定的,她高贵如一位伯爵夫人,但其实是一个商人的妻子。达·芬奇用心良苦,他要同一张画上反映出新与旧对立的主题,这种两重性就揭示了新与旧的对立。这种认识是注重因果的历史方法研究出来的,因为这种方法注重考察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不会混淆两个时期艺术品的内涵。

三

中国史学家研究文明,注重研究人,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研究文明交往中的人类和谐。这些方法也可以运用到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郑和是一位对世界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对他赞赏有加。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他对郑和下西洋发出过如此感叹:“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能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62艘船,载有28000人……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中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

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①

这段话的前一部分是客观的历史陈述,但最后的两个“本应”却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的汤因比发出的惋惜。问题在于:既然郑和的航海旨在传播友谊,既然他所到之处的统治者都对他“肃然起敬”,又如何能够判断他的出航目的一定在于“征服”:不仅是占有霍尔木兹海峡,还要绕过好望角;在西班牙人之前发现并征服美洲?

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学的创始人之一,读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第71章的路德新教部分,就知道他言辞确凿,没有一句话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在《历史研究》单卷插图本里,他却认为,历史学家会制造意义:“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所考虑的客观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看法当作公理,即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某种意义或者‘制造’历史的意义。只要他在两个事件之间建立某种因果联系,他就开始‘制造’过去的意义;也就是说,把过去整理成某种秩序并然的体系,以便人们能够理解。”^②从中可见,汤因比对郑和的研究,失误是在“制造意义”方面。在这里,他背离了历史的真实,用西方人的想象代替了客观的历史陈述。在中国史学家看来,这是错得非常离谱的。

因古代中世纪长期政治分裂、近现代社会又高度竞争的缘故,西方人具有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古代中世纪,有灵与肉、暂时与永恒、人间与天国的对立;在近现代,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此不同,自秦汉以来,虽有分裂,但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国家,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因为只有修身、养性、齐家,才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没有要把各种事物硬性地找一个相反面,再把它们对立起来的习惯。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高情感的文化。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情的,“天人相合,天地有情”。天地怎么有情呢?天和地在一起,那就要生万物,就会生阴阳,就会生五行,所以,中国的本体论,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以人为本,自然有情,人与自然之间是要取得和谐。同样,还要取得人与人的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在天地人那里,突出的还是个人字。天地生万物,人要孝敬天地,孝敬父母,这是中国的本体论,并没有把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起来。

中国的认识论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要求二元中合、二元和谐。天与地要合一,人与事要合一,物质与精神也要合一。灵与肉要合一,怎么合一呢?我们说,孔子是大思想家,但是孔子确实是提出“食不厌精”的人。苏东坡是大文豪,但是东坡肉也是他研究出来的。所以,灵与肉完全是合一的。

中国文化是求真和强调现实的。认识论上求的真就是返璞归真,还自己的初心。这是中国人的心性,也是中国人要求实施的实践理性。

中国的美学是特别强调情境合一的,要产生一种情境,用美来陶冶性情,产生善,在中国善是怎么来的?是用美陶冶出来的。西方的美也有一种作用,用美来激励你当英雄,中国人认为一切世俗的劳动,一切与改善有关的劳动,都堪称是集体的劳动。因为,那是大家的工作,是整体的活动,功劳也不归功于个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利他主义。

这样的文化背景,使中国的史学家视国家统一、人类和谐为文明的进步。文明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其中有世界各个国家的贡献。这种追求世界大同的理念,与视文明为冲突、为战争来源的史观非常不同。强调文明的发展,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历史演进今古相承,古为今用,今胜于古,这都是中

^①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页。

^②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刘北城、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国史学的传统。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对欧洲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中国史学家认为,要实现和谐,国家制度的创新是关键。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日耳曼人在欧洲建立十来个“小王国”,但是,这些王国还比较落后,仅处在部落制度向国家转型的时期。政府统治靠的是以国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私人政治网络,没有固定的疆域,政治分裂,地方割据,也没有完善的政府机构。更为致命的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常见,公权力常被用来服务于私人利益。11世纪,这些小王国瓦解,让位于英国、法国那样的领地国家。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国家规定公权不得私用,领土比较完整,不仅政治统一,而且机构齐备,国家掌管司法和税收,欧洲政治渐渐步入正轨。15、16世纪欧洲发展出民族国家,主权分散走向了主权完整,对个人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体制转变为专业化、制度化的国家体制,这说明国家制度的发展对于社会和谐是何等重要。

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和谐,政府管理公共利益是关键。在欧洲,由于长期政治分裂,社会生活与国家生活分离,公益活动掌握在自治社区、教会和地方领主手里,导致人民生活痛苦,禁欲主义流行,加剧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文艺复兴初期,但丁、彼特拉克等人提倡美德,致力于用道德建立社会秩序,收到一定效果。14、15世纪,佛罗伦萨城邦国家在“市民人文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政府管理“公共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得到大幅度改善。15、16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后,国家成为中心,开始了全面性的社会管理。启蒙运动后,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国家与社会和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形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格局。

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键在于环境保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键在于积极、主动打造整个大民族的文化认同。中世纪德国的全名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其实名不副实,被伏尔泰称之为“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①以语言为例:各地德语的发音非常不同,有西部的“法国音”,南部的“意大利音”,东南部的“斯拉夫音”,只有中部在讲比较纯正的德意志语。后来德国利用文化和科学优势,在数学、物理学、光学、生物学、医学、哲学、音乐、文学方面走到世界前沿,同时,在环境保护和福利制度的建设方面也极有特色。德国不仅把语言统一了,也把德意志民族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了。其正面经验是避免了民族分裂,积极地打造全国性的文化认同,增进国家凝聚力;反面经验是纳粹搞民族分裂和种族主义,把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文化精英驱逐出德国,德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大为削弱,几乎一蹶不振。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探讨文明,能够看到文明是治乱兴衰、强国富民的强大推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强盛的国家都是文化强国。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出“文化兴,则国家强”的规律性。远古的人们通过“文字、城市、国家”告别了原始社会,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化、科学、创新”建造现代世界。没有文化,哪有思想;没有思想,哪有创见;没有创见,又哪有强国富民的大政方针?一部文明史,讲的都是文化兴国的道理。

文化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看,能够知道为中国找到一个世界发展中的有利位置是何等重要。在世界大文化格局下,国家是按照规则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如一个齿轮咬住另一个齿轮,却又在运动之中有规则地行进。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代表了一种高

^① 伏尔泰《风俗论》中册,梁守铿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0页。

层次的和谐、相容和包容。当今世界,谁具有文化上的引领性,谁就拥有建设现代国家的制高点。研究文明关乎国富民强并且触及国之根本,对此又有谁能够不参与、不投入呢?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

吴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21世纪以来,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文明史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受到关注并很快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文明史研究受到重视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西方文明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到史学工作者,甚至普通读者对文明是如何发展的认知;^①二是在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下,国内相继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文明史著作;^②三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将有关文明史研究的课题“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列为重大课题招标项目,最终由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学者共同中标;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就不同文明间如何相处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答,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观点。学者们在阐发习总书记的文明交往观点、批判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等谬论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助推了文明研究热潮。^③不过,中国学者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明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已成为中国史学界文明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浅见供研讨。

一、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国历史学的最大特色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作为历史学分支领域的文明史研究自然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种理论指导主要体现在四种分析方法上面。

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在文明史研究中坚持终极原因追溯法。唯物史观从人类必须吃喝住穿才能生存这一简单事实出发,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文明,一般被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学者们多是从列举这些成果来书写文明史的,但很少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间的关系做探讨。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更强调精神文明的作用,像韦伯就将西欧地区率先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缘由归因于精神信仰层面的演变,即新教改革,未能追溯精神信仰层面演变发生的缘由。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则需要追溯到物质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在人们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导致的一系列变化中去追索精神层面发生演变的终极原因。像马克思明确地将西欧率先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缘由归因

① 21世纪以来有十余种西方学者写作的文明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较大的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斯特恩斯的《全球文明史》、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等。

② 21世纪以来有近十部中国学者写作的文明史著作出版,影响较大的有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③ 《人民论坛》杂志2019年7月下旬刊的特别策划栏目以“中华文明特质与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推出了系列文章,包括《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马克思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及特点》《西方文明的演进历程及特点》《中华文明基本特质与不同文明的平等共处》《“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文明互鉴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等文章。